

鲁迅研究丛书

鲁迅在西安

单演义著



鲁迅研究丛书

鲁迅与山西



单 演 义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鲁迅研究丛书

鲁 迅 在 西 安

单 演 义 著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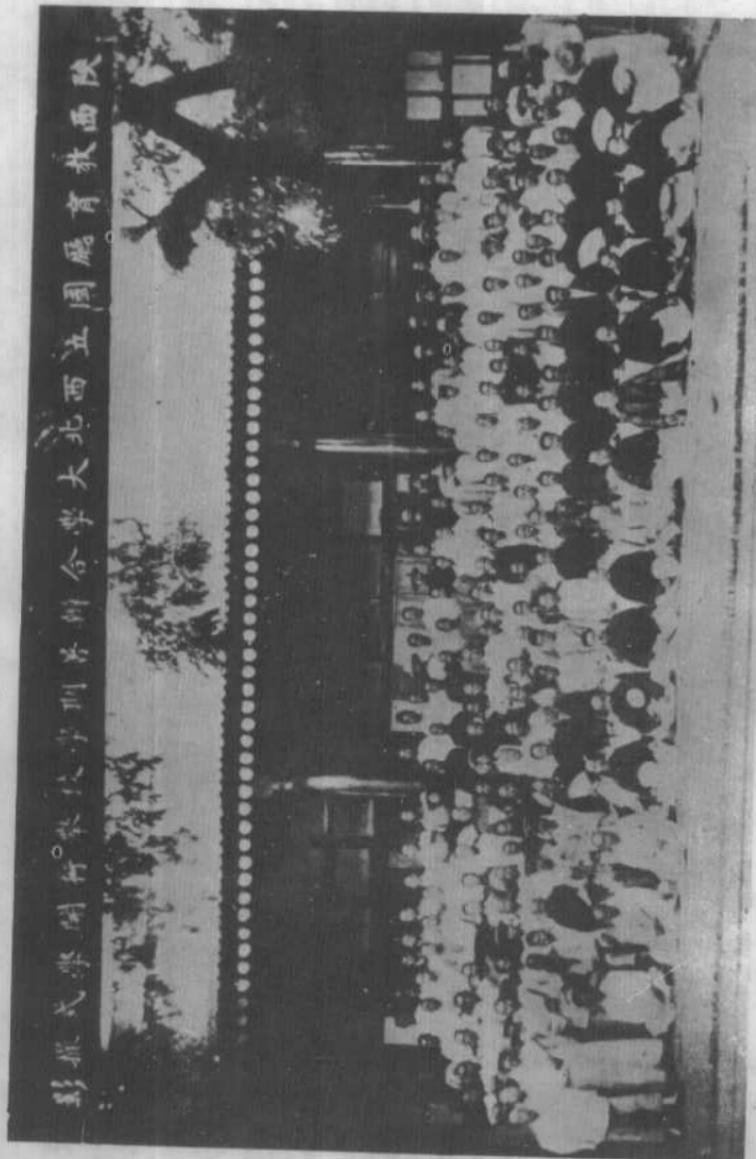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25 插页2 字数120,000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

统一书号：10094·327 定价：0.51元



西北五省聯合大學開學式攝影

魯迅在西安暑期學校開學式上的攝影
(第二排右起第十一人為魯迅)



鲁迅在当时西北大学
的住室

鲁迅到西安后的日记

十一月廿九日 星期六 雨
上峰山住处尚未用完，需多些时间，故未归。中午
饭后到南院林，在林下空地挖出土来，种些植物，以资点缀。
下午到北院林中，见一株大柏树，其根部已断，但枝叶茂盛，仍
然挺拔。在树干旁挖出一小块空地，种些小草，以供观赏。
林中有一块大石碑，碑文模糊不清，但依稀可见“西夏王陵”
字样。碑前有几株高大的松树，枝叶繁茂，挺拔苍翠。
傍晚时分，天色渐暗，我开始整理行李，准备返回住处。
十二月一日 星期日 阴
早晨起来，天色阴沉，气温较低。我穿上厚实的羽绒服，戴上
帽子和手套，继续在林中散步。经过一片灌木丛，发现一些
野花，虽然不名贵，但它们在寒风中依然顽强地生长着。中午
饭后，我回到住处，休息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在林中漫步。
下午，天空逐渐放晴，阳光洒在大地上，显得格外温暖。我
决定在林中多待一会儿，享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风光。直到
天黑，我才返回住处。



收有魯迅講稿的
《講演集》(二)



魯迅(周樹人)與別人聯名
贈給易俗社圖額(複制，年代寫錯)

中央人民政府用院牘

演義

同志：

序来的鲁迅日记两函信收到，已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汉口，倘那里不拟印，
不记，直接寄回你处。

这个编注本，很费苦心，经过许多周折，实
为不易。据你方才言见略，似得汉宣的呈去书
程及前廷撤缺还之疏，这些人在鲁迅当时自然
尚未暴露，其妻同界状，故未乞情。但在今
天已坐实，而且为世莫要，是否仍予刊载，尚
得权衡。鲁对当时的延安以及北方军阀，是极
小心对待的，故对军士也只讲小说，自己才写。以
上这些，亦请人民文学出版社参考了，致

许广平
十一月廿一

许广平〈致单演义〉

目 录

第一章	陕西社会面貌鸟瞰	(1)
第二章	“国立西北大学”简介	(6)
第三章	关于西大的“暑期学校”	(8)
第四章	鲁迅应邀来西安	(15)
第五章	在西安讲演的特色	(28)
	一、“前言”是讲稿钩玄提要的指导思想	(29)
	二、讲稿为《史略》精华的缩编	(35)
	三、补充《史略》未曾论及的观点和例证	(46)
	四、联系实际、通俗严正的讲法	(65)
第六章	鲁迅后来对《史略》及讲稿中某些观点的修正	(73)
	一、关于《金瓶梅》的作者问题	(73)
	二、关于《西游记》的作者问题	(74)
	三、关于《红楼梦》“自叙”说	(75)
第七章	游览名胜古迹和购买古物	(79)
第八章	鲁迅与易俗社	(90)
第九章	鲁迅冷对军阀和名士	(96)

第十章 鲁迅回北京	(104)
一、旅途情况	(105)
二、校订修改讲稿.....	(109)
三、对西安友人赠书通信.....	(111)
第十一章 鲁迅与康有为来西安讲学的比较观	(114)
一、“薄明的天色”的中国	(114)
二、两种不同的约请.....	(115)
三、刘镇华是怎样分别迎接他俩的？	(116)
四、两人讲学的不同内容	(117)
五、在讲学中两人对刘镇华的相反态度	(122)
六、鲁迅与康有为的赴孔庙	(123)
七、康有为的游南山与鲁迅的游南院门	(124)
八、康有为的被驱逐与鲁迅的被欢送	(127)
九、先恭后倨与先倨“后恭”	(131)
第十二章 鲁迅在西安讲学的影响	(134)
附录	
一、谈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 [日本] 竹内实著 李汝松译	(146)
二、鲁迅与陕西青年作家	单演义 (161)
三、《陕西旅行纪》第二章：	
长安之观察	王桐龄 (183)
后记	(195)

第一章 陕西社会面貌鸟瞰

为了全面理解一九二四年鲁迅西安之行，我想在本书的开端简略地介绍一下当时陕西的社会面貌。

当时的陕西完全处于反动军阀刘镇华的统治下。刘镇华原先驻扎在河南，号称镇嵩军，势力并不雄厚。在直皖战争中，皖系军阀陈树藩邀他支援，他率领军队进入陕西，很快地当了陕西省省长。但是，刘镇华并不是真心实意地支援陈树藩，而是大耍两面派，暗中向直系军阀频送秋波。因此，当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攻打皖系军阀陈树藩时，刘镇华袖手旁观，按兵不动，致使陈树藩兵败，被驱逐出陕西。直系军阀阎相文占领了西安，成了陕西督军，而刘镇华仍然保持省长地位，并且乘机扩充了自己的势力。

阎相文虽然身为陕西督军，但他庸碌无能，生活糜烂，整天抽大烟，结果军事大权落在冯玉祥手中。后来冯玉祥诱杀陕西军事首领郭坚，使陕西军事局面陷入僵持状态。阎相文因此受到吴佩孚的严厉斥责，同时冯玉祥以军力相逼，向他勒索军饷，他被弄得走投无路，竟吞烟土自杀，于是冯玉祥遂任陕西督军。在冯玉祥与阎相文磨擦时，刘镇华仍采取

骑墙两面讨好的故技，结果在冯玉祥当了陕西督军后，他仍然是省长，这说明他确是“工于心计，善于应付”的奸猾之徒。

一九二二年直奉两系军阀战事发作，冯玉祥奉曹锟、吴佩孚命令开往河南和赵倜作战。由于刘镇华善于奉承，居然取得冯玉祥的信任。冯在离陕之前，即将他的督军职务交给了刘镇华。于是刘镇华就成了陕西督军兼省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在刘镇华统治下的陕西，各方面都是非常落后的。水利不修，交通梗塞，经济凋敝，加上刘镇华滥招豫陕土匪，扩充军队，大开烟禁，搜刮民财，弄得民不聊生。

下面着重谈谈陕西的文化教育情况。

当时陕西文化教育界竭力提倡理学，宣扬国粹，使封建文化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如报纸上发表的《孔子与康德》、《太戈尔在香港孔教会之讲演辞》等文章，宣扬孔子的天伦人道。还有王抚五的“相对论”、傅铜的“轮化论”（即所谓“圆圈论”）等的讲演，大肆散布封建毒素。至于号称“圣人”的封建余孽康有为来西安大讲孔教，更是闹得一片乌烟瘴气。

陕西的中学教育内容也大都是国粹玄学。所用的课本有《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中学国文评注读本》（商务印书馆出版）、《庄子》等，均系文言，几乎没有白话作品。再加上教学方法不善，学生根本听不懂。据《西北大学周刊》所载的《五里雾中》一文说：“上堂的时候，先

生讲的是《庄子·逍遙游篇》，讲到‘故曰：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说是庄子的基本学理（？）可是精微奥妙，非普通人所能领悟（！）随手又写了一首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不使有尘埃’。恐怕学生不能明白，又注释一首：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着尘埃。使我头脑奇痛，真是莫名其妙呵！……总而言之：这一堂是在五里雾中！”由此可以看出学校中讲读古文的情况了。

由于反动当局竭力提倡国粹，致使一些教师泥古不化，对新学术新思想竟所知甚少。如一九二四年的《新秦日报》曾刊登《国文教员的笑话三则》：一则说一中学教师改作文，见学生作文中有“拜金”二字，居然批道：“‘拜金’二字少见，出自何处？”二则是说某一中学校舍被军队占用，学校负责人请一语文教师写一呈文，这位教师竟在呈文上写道：“此辈来自田间，不学无术。”三则是某一语文教师看学生作文，见有“孟德斯鸠”四字，即叫来学生问道：“‘孟德’既是曹操，‘斯鸠’又是什么人？”结果传为笑柄。中学语文教师的知识居然贫乏到如此程度，可见当时陕西教育界的一班了。

这也难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时北洋政府竭力抵制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据《新秦日报》民国十三年六月二日教育界消息栏内《严禁学生习染赤化之中央电令》一文中说：“闻当局近接中央电令略谓近查各校学生多不专于学业，误以共产公妻之谬论，为过激主义之宣传，长此以

往，不仅遗害学生本身，抑且妨害治安，声乱国体，应即饬属从严取缔，以维大局而安地方云云。”类似这样的严令很多，致使很多人不敢接受新文化、新思想。

但是，陕西的文化教育界并不是死水一潭，也存在着革命者的呐喊和斗争。如西安第三中学教务主任、地下党员魏野畴曾组织和鼓动学生反对教育当局的“委员考试”（即毕业会考），西安第一中学教师、地下党员和魏野畴、张寒辉等发动学生与刘镇华部下第七师师长吴新田的斗争，使刘镇华大为震惊。

另外，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西安进步青年曾经组织了两个进步的学社。一是共进社，社员有杨钟健、李子洲、王功睦、段绍九、魏野畴、刘含初（地下党省委书记）、谢子长、刘天章等；一是进化社，社员有李向辰、王捷三、李子亭、张锋伯等。他们出版了《共进》、《西北晨钟》、《青年生活》等刊物，积极宣传进步思想。

在陕西外县，以反动的政治压力较小，革命者与进步青年便于活动。据马凌甫说：“……当时陕西文教界存在着三种意识形态，新文化运动是主流。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有了苗头，正在发展，当时的学生联合会就是由他们主办的。也有一小部分人坚持封建礼教，不肯接受新思潮，一般称‘圣系’，也就是孔教会的先生们。”（《我所知道的刘镇华》见江苏省暨南京市委员会《历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又据张仲侠说：“……新生的革命思想，新文艺思想已蓬勃兴起。自然，这是在当时的西安报章上见不到的。例如，那时

的刘含初及王绶金……诸先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领导学生思想的；三原的新生力量也很壮大；华县的咸林中学，王福生、魏野畴诸先生教国文历史，他们给学生许多新知识，教学生读李大钊、鲁迅、茅盾、郭沫若等先生的作品及《共进》、《新青年》、《向导》等杂志的文章，也为广大青年所欢迎。……绝大多数的学生都跟着他们走……。
鲁迅先生来陕，正是新旧力量斗争之时……”。（一九五七年一月九日致笔者信）

因此，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来西安讲学，对于革命者和进步人士来说，有如严寒中突然拂来一股春风，他们当然是非常欢迎的。

第二章 “国立西北大学”简介

“国立西北大学”是一九二三年反动军阀刘镇华督陕时代设立的。在这以前，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后曾由陕西督军张凤翔回设立过西北大学；之后，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平津沦陷，在西安又成立了“西安临时大学”，是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天津北洋工学院等校迁西安合并组成的，继迁城固，改名“西北联合大学”，又改名“国立西北大学”，抗战胜利后迁回西安。解放后名“西北大学”，今已成为全国重点综合大学之一。

一九二四年鲁迅来西安讲学住在“国立西北大学”，那时的校址是在西安城内东木头市（今为西安市第二十中学校址）。鲁迅住在教员宿舍北院，当时的住室已改为鲁迅先生纪念室，今尚保存。

“国立西北大学”设立时，曾合并了法政、水利两个专门学校，将法政学校的学生编为法科专门部，将水利学校的学生编为工科专门部。预科分为文理两部。还设立了国学专修科和蒙藏专修科。学校部门虽然繁多，然而学生不过一百六十余名，教职员却有一百五十余名。校长是刘镇华的同

乡，即讲“轮回”谬说的傅铜。

这里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即反动军阀刘镇华为什么要设立“国立西北大学”？对于这个问题，共产党员魏野畴曾撰文作过深刻的分析，他说：“刘氏祸陕八年，擅开烟禁，滥招匪徒，无恶不作，而欲竭力以办一大学者，其目的不外三端：（一）欲以办大学沽名钓誉；（二）欲以办大学置私人傅铜；（三）欲以办大学多取陕人之脂膏。……刘镇华固奸猾人也，既获提倡大学之美名，兼可置私人，以效奔走（年前嗾使傅发起四省协会即是一例），更可藉此开一敛财之途，以多取于陕民，此烟卷特税所以设也。烟卷特税每年征收总额固不止维持一西北大学，其余额即可为刘氏掠去，以填其私囊；或增招兵匪，多买枪械，杀戮陕人。此当日刘氏熟思审虑而决然举办之理由也。”（《西北大学问题》，载一九二五年四月九号《平报》）这真可谓一针见血的揭发，使反动军阀设立“西北大学”的阴谋暴露无遗。所以当时的进步刊物《共进》四十五期发表哈雷的《非所谓“西北大学”》一文中指出：“我愿头脑清楚的人联合起来，反对为刘镇华作面具的西北大学，反对名不符实，大言欺人的西北大学，反对下流无耻辈以之作传布谬说与吃饭机关的西北大学，我们主张要筹设的一个大学，乃是一般真正的科学家、哲学家……所主办的平民化大学，而这个大学，至少也要不为军阀张目，脱离恶政治的影响。”哈雷的意见代表广大进步人士的呼声，但在军阀统治下的旧中国是无法实现的。

第三章 关于西大的“暑期学校”

一九二三年七月，军阀刘镇华为了沽名钓誉，委托西北大学校长傅铜邀来朱希祖、王星拱、陈大齐、徐旭生及美人柯乐文作过讲演。他为进一步扩大影响，于一九二四年的暑假前，与陕西教育厅合议，筹设了一个“暑期学校”。这个“暑期学校”在正式成立之前，还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由西北大学校长傅铜任委员长，西北大学法科主任蔡江澄任副委员长。学校的组织共分七股：一、庶务；二、会计；三、文牍；四、登记；五、课程；六、印刷；七、招待。除印刷、登记二股由教育厅派员主管外，其余均由西大及个别中小学教职员分担。

应邀的讲师计有十多位。根据当时的暑期学校的简章及以后出版的《讲演集》，将这十多位讲师的姓名、略历及讲演题目等，列表如下：

姓 名	别 号	籍 贯	略 历	讲 演 题 目
王桐龄	峰 山	直 隶	北京师范大 学历史教授	一、《中国文化之发源地》 二、《历史上中国六大民族之关 系》 三、《历史上汉民族之特性》